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下卷)

(第二版)

王庆生 王又平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下卷)

(第二版)

主 编 王庆生 王又平
副主编 李遇春 严 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下卷)(第二版)/王庆生 王又平 主编. —2 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22-4789-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482 号

中国当代文学(下卷)

(第二版)

© 王庆生 王又平 主编

选题策划:刘晓嘉

责任编辑:朱贝贝 刘晓嘉

责任校对:刘满元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67863426,67867371(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1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2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9.00 元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下卷 新时期文学

第一章 文学概况和理论批评	(3)
一、思想解放运动和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3)
二、反思历史和回应现实的文学理论批评	(9)
三、作家的自由选择和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17)
第二章 小 说 (上)✓	(29)
一、小说创作概观 ✓	(29)
二、刘心武、从维熙、冯骥才等的伤痕小说 ✓	(39)
三、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的反思小说 ✓	(47)
四、蒋子龙、路遥、张炜等的改革小说 ✓	(56)
五、宗璞、张洁、铁凝等女性作家的小说	(65)
六、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作家的小说	(76)
七、乌热尔图、霍达、阿来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	(86)
八、姚雪垠、凌力、二月河等的历史小说	(93)
第三章 小 说 (下)✓	(104)
一、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等的市井小说	(104)
二、贾平凹、莫言、陈忠实等的乡村小说	(114)
三、残雪、王小波等的现代主义小说	(125)
四、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的寻根小说 ✓	(134)
五、马原、余华、格非等的先锋小说	(142)
六、方方、池莉、刘恒等的新写实小说	(152)
七、刘震云、苏童、叶兆言等的新历史小说	(159)
八、林白、陈染等的新女性小说	(169)
第四章 诗 歌	(177)
一、诗歌创作概观	(177)
二、艾青和“归来的歌”	(184)

三、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等其他归来诗人的诗	(189)
四、曾卓、绿原、牛汉等原七月派诗人的诗	(197)
五、穆旦、陈敬容、郑敏等九叶诗人的诗	(203)
六、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等的现实主义诗歌	(212)
七、舒婷、顾城等的朦胧诗	(218)
八、昌耀、杨牧、周涛等的新边塞诗	(225)
九、江河、杨炼、海子等的文化诗	(233)
十、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诗人”的诗	(243)
第五章 散文	(252)
一、散文创作概观	(252)
二、巴金、杨绛、萧乾等的忆旧散文	(260)
三、余秋雨、马丽华等的文化散文	(269)
四、张中行、周国平等的学者散文	(273)
五、王英琦、斯妤等的女性散文	(279)
第六章 报告文学	(286)
一、报告文学创作概观	(286)
二、徐迟、黄宗英等的人物专题报告	(293)
三、钱钢、李延国等的全景式报告	(303)
四、麦天枢、贾鲁生等的社会事件报告	(308)
五、赵瑜、何建明等的深度跟踪报告	(312)
第七章 话剧	(317)
一、话剧创作概观	(317)
二、崔德志、丁一三等的现实主义剧作	(324)
三、苏叔阳、李龙云等的市民生活剧	(332)
四、沙叶新、高行健等的实验戏剧	(339)
后 记	(347)

下卷

新时期文学

第一章 文学概况和理论批评

一、思想解放运动和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是伴随着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时刻一起到来的。极端激进主义路线的破产使摧残殆尽的文学艺术事业再度逢生，潜行十年之久的文学地火终于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崩塌的溃口中喷涌而出，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

新时期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时刻发生和发展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新时期文学在现代和传统的碰撞中，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中，为自己拓展出了一个繁荣的局面和广阔的前景，并正以其丰厚的底蕴、斑斓的色彩、充沛的活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

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以“四人帮”的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的，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的转折为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契机，在人们欢庆政治解放的同时，文艺界以批判“帮派文艺”为主旨的拨乱反正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文艺界对“四人帮”的批判主要是政治批判，它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批判“阴谋文艺”，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图谋和极右政治路线；二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倒“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一大批受到诬陷的作家作品翻案。

文学界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运动来自并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77 年，各级报刊围绕着“四人帮”的“极右实质”和“阴谋文艺”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通过“揭老底”、“批黑文”，还“四人帮”的“历史

本来面目”，批判了“阴谋文艺”的理论与实践^①。这些批判推进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全国文艺界的开展。与此同时，各级报刊还为受到“四人帮”诬陷的作家作品发表了大量翻案文章，使《保卫延安》、《红岩》、《上海的早晨》等优秀作品得到重新评价。事实表明，文艺界的大量冤假错案是根据“文艺黑线专政”论制造出来的，要在根本上纠正冤假错案就必须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1977年12月，《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部分作家举行座谈会，并开辟出“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许多身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愤怒地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阴谋文艺的重要理论基础，阴谋文艺的开端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翻了案，使许多作家作品从文化专制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为文学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中，对“四人帮”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虽然在形式上是激烈的，但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倾向，因此文艺界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总的说来仍是在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

1977年5月《人民日报》在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发表的社论中称：“‘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反动。”^②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文艺界把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同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挂在一起，严重地混淆了是非界限。一味批判所谓“极右路线”，使“文革”后的文艺思想继续滑行或徘徊在“左”的轨道上，而对“四人帮”的批判仍然贯彻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的指示仍然被奉为指导思想。这些情况表明，要彻底地实行拨乱反正，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由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自此，全国思想理论界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

① 参见任平：《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1976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文物出版社批判组：《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1976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钟广屏：《“浩然巾”下的右派嘴脸——评姚文元的一篇反党文章》，1976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文化部批判组：《“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1976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文化部批判组：《评“三突出”》，197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

② 197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

了大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①，它也在文艺界激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老作家纷纷撰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茅盾在文章中揭穿了“四人帮”抛弃实践、践踏真理，“在文艺领域另立一套帮规帮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阴谋，明确提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巴金也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这里设‘禁区’，那里设‘禁令’，什么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不见得很妥当”；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搞科学，不搞迷信，真正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②。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和舆论的准备。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③。会议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也为文艺界实行彻底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艺》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批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专栏文章，《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还联合召开了“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作家和批评家们指出，在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还须彻底否定“文艺黑线”论，推翻《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黑八论”，不纠正这个冤案，文艺战线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不能彻底完成^④。1979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搬掉了压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巨石，新时期文学犹如开江的春水奔腾浩荡，真正迎来了它的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在北京举行。

第四次文代会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最隆重的文艺界的盛会，出席这次盛会的代表达三千二百多人。当历经磨难的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劫后重逢、欢聚一堂时，无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② 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巴金：《要有艺术民主的局面》，均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④ 参见《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彻底解放文艺的生产力——本刊和〈文学评论〉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简记》，《文艺报》1979年第1期。

不思绪万千，心情激动，他们深切缅怀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而不幸逝世的二百多位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文艺家，共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大计。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祝辞宏观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成绩，阐明了文艺同人民、文艺同政治的关系和党如何领导文艺等问题，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他明确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在论述文艺同人民的关系时，祝辞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祝辞还十分强调党要按照文艺的根本规律去领导文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要抛弃衙门作风，废止行政命令，提倡和鼓励“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充分发挥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和个人创造精神^①。邓小平的祝辞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抓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症结所在，指明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

根据茅盾在开幕词中提出的第四次文代会的议题，大会认真总结了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任务。

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作了总结。报告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肯定文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左”的倾向给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不可低估的。他结合文艺工作的实践指出，能否正确处理文艺同政治、文艺同人民生活、文艺中继承传统同革新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在这三个关系中，文艺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从根本上说，文艺同政治的关系就是文艺同人民的关系。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但政治不能代替艺术，艺术不等于政治。不应把文艺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某项具体的政治任务。培养社会

^①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也是它的政治任务。在文艺的批判继承同革新的关系上，周扬指出，一方面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正确地对待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要把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拿来加以改造，发展和创造民族的新形式。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既不能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遗产，否定传统，又不能以保守的态度对待革新，反对创造^①。周扬论述的三个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应当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对新时期文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

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倡导思想解放、文艺民主，深入清理和批判“左”的思潮的大会。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是有害的，因为文艺界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只是刚露了一点头。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茅盾也强调：“首要是解放思想，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领导而言。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创作方法也该多样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②

通过讨论，大会明确了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六项任务：积极发展文学艺术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提倡文艺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也要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各种形式、体裁和各自不同的风格，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得到普及；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加强和扩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发展和建立同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

思想的解放和目标的明确，使第四次文代会标志着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历史性转折集中地体现在党对新时期文艺方针政策所作的调整上。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辞中明确提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

^① 参见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7页。

^② 茅盾：《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①。稍后，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②。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过去惯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社论肯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也着重指出了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社论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至此，“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政策被确立下来。

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清新空气和第四次文代会作出的政策调整，使文学界又一次感受到了“春天”的到来，尽管在这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还不时有“冷风”吹来，但是混淆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的做法、以行政方式干预文艺的做法遭到了普遍的反反对，对政治批判的抵制和对政治运动的防范已经成为多数文艺领导人、作家和批评家的共识，因此，在第四次文代会后发生的多次文艺论争都被遏制在政治运动的边缘，1980年在京举行的剧本座谈会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相继造成“轰动效应”以来，文学创作在一个短时期内几乎重演了50年代“百花文学”的繁盛，批判的锋芒直指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和种种社会阴暗面，俨然是“干预生活”的再现，而且更加犀利和率直。最具震撼力而引起争议的作品主要有小说《飞天》（刘克）、《调动》（徐明旭），剧作《在社会的档案里》（王靖）、《女贼》（李克威）、《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沙叶新），稍后还有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将军，好好洗一洗》和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诗作。这些作品在引起读者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了激烈的政治批判，被指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诋毁人民军队”等。但是这类“前朝曲”在第四次文代会后宽松、良好的氛围中多少显得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倒是复刊不久的《文艺报》以善意和开放的姿态

①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②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设置讨论专栏、发表分析性文章，阻遏批评意见“上纲”为政治批判。为了研讨文学创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1月至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联合举行剧本座谈会，包括周扬在内的主要文艺领导人和各省市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与会，时任中共中央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也到会讲了话。这个会议尽管在讨论中对上述几个作品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而且限制了它们的演出和发表，但是也没有扣上什么“帽子”，更没有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文艺问题，这是对历史教训的充分吸取。因此，在对待“有争议的作品”的问题上，剧本座谈会开了一个以文艺争鸣取代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良好先例，此后在对待一批写人性、鼓吹人道主义的作品时，在对待朦胧诗和现代派的问题时，在对待诸多有争议的作品时，虽说不乏“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有时甚至走到发动政治运动的边缘，但是因为文艺问题或文学创作而酿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情况则是少有了。这是新时期文学得以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较快地兴盛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反思历史和回应现实的文学理论批评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以及外国文化（文学）思潮和各种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影响，文学理论批评所探讨的问题日趋广泛，所涉及的知识领域远远不限于文学自身，总体来说，构成了两个基本面向：其一是反思历史，对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的理论观点予以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其二是回应现实，对当前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予以关注和研究。这两个面向相互推动，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批判，其思想的活跃、眼界的开阔、学派的林立、成果的丰硕，远非新中国成立二十余年来所能比，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批评的时代”。

在反思历史方面，对整个新时期文学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主要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以及现实主义等问题的再讨论，这几场讨论可以视为新中国文艺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它们打破了庸俗社会学和艺术教条主义的桎梏，动摇了革命年代形成的文学观念的根基，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清理出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再讨论，是新时期之初震动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次理论争鸣。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

并从属于政治”（以下简称“从属论”）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下简称“工具论”）一直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动摇的基本观点。新时期之初，就有批评家提出需要重新审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继而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上海文学》在1979年第4期推出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并辟出专栏开展讨论，提出了“为文艺正名”的主张，从而掀起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这一讨论迅速波及全国，各文艺和学术部门纷纷举行讨论会展开专题探讨，数十家报刊在一年内发表的争鸣文章不下数百篇。

论争之初，“为文艺正名”的主张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维护旧说的批评家坚称，“工具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是阶级社会中文艺的本质属性”。更有人以大批判的姿态给“正名说”扣上“陈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新翻版”，“削弱乃至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实行资产阶级的文艺主张”等帽子^①。持“正名说”的批评家则结合文艺的特性、文学史的事实和中国文学的实践，批评了“从属论”和“工具论”，阐说了“为文艺正名”的主要内涵：其一，主张恢复文艺的特性，反对把文艺变为政治的附庸和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其二，主张恢复文艺以审美为中心的多种社会功能，反对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其三，主张恢复文艺与生活的广泛联系，反对唯意志论对文艺的糟蹋；其四，恢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科学理解，反对简单化地诠释马克思主义。

从文艺的特性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对文艺的要求或规定出发，这是新时期批评家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新的立足点；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全面阐释，为多样化的文艺拓展出开阔的生存空间；取消了写政治、写政策、写中心工作的约束，使文艺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摒弃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观念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更是为新时期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创造了活跃、良好的思想和文化氛围。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讨论者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从属论”、“工具论”由于违背了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从而导致了文艺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第一，它取消了文艺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政治与文艺的“父子”关系终使文艺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推行极端激

^① 参见《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阶级的文艺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驳反对论者及其方法》，《长江文艺》1979年第8期；《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等。

进路线的工具；第二，它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泛滥的主要原因，它庇护着大量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又扼杀了许多具有思想和艺术独创性的优秀作品；第三，它为粗暴的行政干预、专横的政治裁决提供了口实，使“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之风盛行，助长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发展；第四，它导致了文艺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由“第一”进而推演为“唯一”，使文艺批评蜕变为政治批判，酿造出大大小小的非文艺的“文艺斗争”和文艺冤案。

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讨论的直接结果就是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为新时期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问题的讨论，同样属于旧话重提。自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下了定论以来，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就不曾止息过，在“文革”中更是达到了高峰。但是经过“文革”的劫难，即便有人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持疑，甚至担忧“‘人性论’、‘人道主义’已使某些同志在文艺创作上走向歧途”，但也不能不承认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热”“是苦难历史的反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①。大多数批评家则由衷地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与表现人性、人道主义非但不相悖，而且应当比资产阶级文学更能深刻地揭示人性、表现人情、高扬人道主义，并从不同角度为文学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立论。

朱光潜是新时期最早重申这一观点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文艺作品而没有人情味会成什么玩意儿呢？”他相信，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帮助人、影响人，把人性提得更高，更完美，更善良”^②。曾受到批判的钱谷融、王淑明等人也重申了他们在50—60年代的观点，以为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对人性的真实描写，不但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也是人们无法理解的^③。还有更多的批评家、作家把人道主义视为一

① 参见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参见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③ 参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切优秀作品理应包含的价值，他们相信：“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就其审美本性来说是人道主义的。”^①如王蒙指出：“文学作品是写人的，一篇作品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和它们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不可分的。敌视或蔑视人道主义的人，必定会受到千千万万的自发倾向于人道主义的善良的人们的敌视或蔑视。”^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氛围中，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理论争鸣是在较为宽松、活跃的环境中展开的，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超越阶级性的限制，开始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普遍人性。在关于人性的种种抽象概括中，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自然本性”说，即把人性看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亦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③。第二种是“社会属性”说，即以人的社会性作为人性的本质构成，此说多立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阐述^④。第三种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因素统一”说，即认为人性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此说立论于马克思的《手稿》和恩格斯关于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的论述^⑤。以上诸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不应当用阶级性来否定普遍人性。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道主义连同平等、自由、博爱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归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是在“文革”之后，人们才再度思考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辨明人道主义的内涵和思想实质，是新时期讨论人道主义的起始点。朱光潜指出：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⑥。他的看法得到许多理论家的赞同，并给予了更详明的阐发。汝信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一文中，批评了把人道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种高级的科学的形式”^⑦。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报告

① 谢明德：《文学与人道主义》，《湘江文艺》1981年第2期。

② 王蒙：《“人性”断想》，《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③ 参见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④ 参见王元化：《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丁学良：《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2期等文。

⑤ 参见胡义成：《人·人性·人情》，《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顾骧：《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等文。

⑥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⑦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